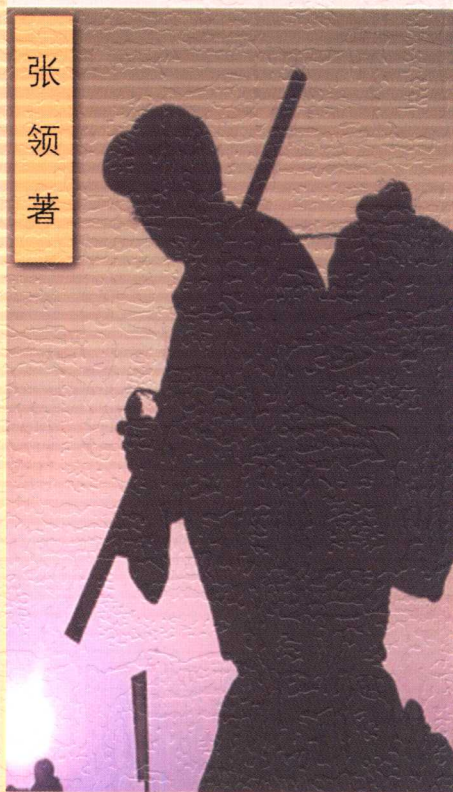


张领 著

流动的共同体

新生代农民工、
村庄发展与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
领
著

流动 的 共 同 体

新生代农民工、
村庄发展与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动的共同体:新生代农民工、村庄发展与变迁/张领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 - 7 - 5161 - 7206 - 3

I. ①流… II. ①张… III. ①民工—研究—中国 IV. ①D66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119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75

插 页 2

字 数 302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探讨的问题	(1)
第一节 选题及其意义	(1)
第二节 过去的研究	(6)
一 农民工研究的两个基本假设	(6)
二 农民工的三个面相	(9)
三 小结:理性、道义与农民工的不同类型	(12)
第三节 研究的样本和方法	(14)
一 选取的样本	(14)
二 研究方法	(18)
第四节 农民工及其分类	(19)
第五节 文章结构	(21)
第二章 理论视点:何种意义上使用共同体	(25)
第一节 共同体概念	(25)
一 与“社会”相对的共同体	(25)
二 共同体与社区	(27)
三 小结	(30)
第二节 共同体的形成机制	(31)
一 血缘关系与共同体	(31)
二 地缘关系与共同体	(33)
三 传统农业与共同体	(37)
第三节 共同体的特点	(42)

一	同情	(42)
二	信任	(43)
三	互助	(47)
第四节	共同体向社会的过渡	(49)
一	“社会”的两大优势	(49)
二	共同体向社会过渡的必然与困境	(52)
三	共同体流动的驱动机制	(54)
第三章	果支村的经济社会结构	(60)
第一节	果支村的经济结构	(61)
一	果支村的地理区位	(61)
二	土地制度	(63)
三	财产继承制	(64)
第二节	果支村的社会结构	(66)
一	血缘共同体	(67)
二	人情与义务编织的社会结构	(70)
三	同质性的社会结构	(73)
第三节	小结	(75)
第四章	规范、目标与处境: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逻辑	(77)
第一节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决策	(78)
一	几种理论模型的论争	(78)
二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原因	(84)
三	流动网络	(94)
第二节	新生代农民工的“场所”与日常“关系”	(106)
一	工作场域	(106)
二	日常关系	(111)
第三节	小结:共同体移植与农民工	(125)
第五章	新生代农民工角色的再定位	(132)
第一节	两个“自己”的协调	(132)
一	共同体:认同与归属	(133)

二 城市:异化与疏离	(135)
第二节 失范与冲突	(147)
一 传统价值的解组与重构	(148)
二 新生代农民工的失范行为	(159)
第三节 整合与调适	(171)
一 专门技术与劳动力市场整合	(172)
二 新生代农民工与共同体的联系	(179)
第四节 小结	(189)
 第六章 流动与共同体的经济变迁	(192)
第一节 经济的现代性表达	(193)
一 农业部门的内部转移	(194)
二 非农化的职业探索	(204)
三 人情的货币化	(209)
四 小结	(215)
第二节 农民工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之路	(217)
一 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与共同体	(217)
二 农民工二代与共同体	(220)
三 小结:经济现代化与观念变迁的双重变奏	(225)
 第七章 流动与政治的现代性表达	(230)
第一节 流动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230)
一 传统社会结构与政治参与	(232)
二 流动:平等的实现机制	(234)
三 流动与传统社会结构的创造性转换	(238)
第二节 农民工外出与村落治理的场域选择	(241)
一 共同体与公共领域	(245)
二 公共领域与乡里空间	(250)
三 乡里空间与乡村治理	(256)
 第八章 结语:现代性及其后果	(269)
一 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	(269)

二 传统:现代性生发的资源	(271)
三 共同体与“社会”的二难困境	(275)

参考文献	(279)
------------	-------

后记	(291)
----------	-------

第一章 探讨的问题

中国农民工总人口目前已达 2.36 亿，如果全国按 14 亿人口来算，则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是农民工。在农民工中，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农民工现已经 50 多岁，几乎可以预计他们已经回乡，80 年代出生的人最大的都已经 30 多岁，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从调查的情况来看，与上一代相比，他们的流动范围更广，距离更远，原因也更为复杂。据统计，“80 后”流动人口在 20 岁之前就已经外出的比例达到 75%，有意愿落户城市的 80 后流动人口中超过 7 成希望落户大城市^①。这些都说明农民工在中国经济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外出无疑已经引起了经济社会的变化。因而研究农民工对社会经济的作用以及他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发生的变化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第一节 选题及其意义

1978 年改革开放至今，已有 30 多年的改革历程。尽管改革只是经济层面上的，但它的影响所及不仅是经济，而且已渗透到社会的其他方面。农村所受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用“静悄悄的革命”来形容恰到好处^②。毛丹先生用“村庄的大转型”来形容这场影响中国每一个农民生活的历史

① 资料来源于卫生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3》，2013 年 9 月 10 号发布。

② Goodman, David S, 刘小京等人用这个词来形容农村的变化（详见刘小京：《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通问题研究》一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编：《大变革中的乡土中国——农村组织与制度变迁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毛丹认为用这个词来形容农村的变化相当恰当（详见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 页。）

事件和社会运动^①，报纸杂志上将其形容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足见这场改革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改革先是从农村引发，渐次进入城市。农村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农民开始富裕起来，原来将农民固定在出生地的管理体制诸如户籍体制、队社体制开始松动，这为农民向城市流动创造了条件。城市经济活跃，建设步伐加快，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农民流入城市成为现实，民工大量涌入城市。据国家计生委统计，截至2012年底，已有2.36亿农民进入城市，80后占很大的比例，中国城市中到处都有农民工的身影。

那么，农民工为什么进城？进城后在行为方式上有什么变化，有何打算？他们对目前的政治经济格局有何影响？早期农民工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研究定位在理性农民假设上，在此基础上推导出一些理论模型和解释范式，比如户籍体制所造成的历史欠账，比较收益、推拉理论、土地压力，等等。这些理论对农民工做了有益的探索。然而，对农民工采取大而化之的这种处理方式，这些理论模型表面看来直接揭示了农民进城的真实目的，但却掩盖了很多事实。比如，我们如何回答农民工进城后不是到处分散，而是聚集在一起的问题？或者，按照比较收益的说法，城市收益比农村高，农民工为何不永久城市化，而是到一定年龄后回乡？或者农民工赚钱后进入的城市是自己家乡的县城，而不是打工地点的城市？这些问题绕不开农民工与家乡的关系，而这一问题不是一句理性农民就能回答得了的。

在农民工外出早期，很多问题还未暴露出来，因而这些概念的解释力受到的挑战还不是很大，但伴随着农民工的大量外出，特别是他们长时间与城市经济社会的互动及其以城市为生活目标，使得农民工外出与家乡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仅仅从经济理性这一理论去解释会出现问题，这一领域中的理论贫困是显而易见的。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学者们很难找到合适的理论思路和概念来解释农民工的行为与农村的关系。于是有人从具有社会文化色彩的道义农民的角度来解释，不过这样的解释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当然，并不是说缺乏理论模型，林葛云的“家”、项飏

^① 毛丹先生用“村庄大转型”来形容浙江乡村社会的发育，其溢美之词跃然纸上。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浙江如此，对于东西部来说，传统和现代的反差更凸显出村庄的大转型来。详见毛丹等《村庄的大转型——浙江乡村社会的发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的“跨越边界的社区”、阿帕都来的“族群地景”、周敏的“移民经济聚居区”及与农村问题相关的现代化理论等可算是农民工与农村关系研究的理论成果。但这些理论是对某一时段的具体案例在具体时间的抽象和概括，对于农民工及其变迁显得概括力不够；或者过于笼统而失去具体事实的描述，忽略了农民工中的细微差别；或者只是对农民工做静态的描述和抽象，因而无法观察农民工长时段的变化。这种理论的贫困导致了相互矛盾的解释。比如，项飏用“跨越边界的社区”对北京温州人的社会网络的描述：这些在外地打工的人利用自己家乡的社会网络来作为实践“大社会”舞台的手段。周敏用“移民经济聚居区”理论说明，移民利用民族认同来追求经济目标^①。直言之，农民工原来的传统不但可以和现代性对接，而且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大有用武之地。因此，传统不但没有消退，反而大为复兴^②，现代化因而可以采用不同于西方的另一条道路。持现代化理论的人却认为，农民工进城后接触了异质文化因而获得了现代性，传统消解了^③，现代化就是走西方曾经走过的路，农民工外出终将成为永久性移民^④。事实上，他们所作的研究就某一特定研究对象而言，极富解释力，但用来研究其他对象，解释力却有限；或者引入大而化之的抽象概念或理论泛泛而谈，对各个地方的具体事实无法涵盖，理论又显得空泛。对于解释农民工及其农村的现代转型这一复杂过程，这些理论分析显得解释力不足。这也是出现上述相互矛盾的解释的主要原因。

对农民工行为的研究建立在理性农民的假设误导了政策的制定者，以至于我们政府部门也按照理性农民的逻辑，将农民工迁入城市，或者主张农民工固守原来的传统，以防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成为流民。事实上，对于农民工集群出发、移植共同体这一事实的回答是以农民工除了

① [美] 周敏：《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鲍霭斌译，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29 页。

② 详见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③ 详见[法]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贺雪峰《人际关系理性化中的资源因素——对现代化进程中乡土社会传统的一项评述》，载《广东社会科学》2001 年第 4 期；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④ Jane L. Parpart, *Labor and Capital on the African Copperbelt*,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理性算计之外，还有社会文化方面的考虑为理论预设的。这意味着：要使农民工的认同发生转移，得花相当长的时间。本书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进行研究的。

从社会文化方面研究农民工，一方面便于理解农民工行为选择的原因及其后果；另一方面，也为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寻找依据，使之更符合实际，减少政策执行的偏差和减小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阻力。在第一代农民工的研究中，笔者已经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但当时主要研究第一代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并不系统。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务工的原因、异地流动以及和家乡保持联系都与第一代不同，而我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这是遗憾的事。但那时的研究确实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不是很多，他们外出的原因以及在城市的行为选择、未来的行为取向等都还未能充分体现出来，研究难以深入下去。现在情况有所不同，第一代农民工绝大多数已经返乡，在异地打工的主力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因此有必要对新生代农民工进一步研究，以期从中找到他们的不同点，以说明现代化对两代农民工的影响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具体转型过程，在知识点上为农民工研究的深化做些铺垫。

事实上，农民工进城还涉及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如果把农民工生活的农村视为传统社会，城市视为现代社会^①，则农民工进城体现了“传统—现代”这一谱系图。从这个角度来说，选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展示“传统—现代”转化的困境和具体的机制。因而，农民工进城所呈现出的种种行为和经典的现代化理论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关系。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家如马克思、涂尔干和滕尼斯等都在理论上推演出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必然趋势。不过，他们仅仅只是从理论上做出了说明。逻辑演绎精致、严密，借助于理论，就好比我们把望远镜倒过来看，它提供给我们事物的整体形象，通过它，我们能从整体上把握某一事物。但是，理论终究无法涵盖近距离观察事物的具体细节。通过对事物的具体研究，才能看清事物的细节，这就好比我们把望远镜正过来看，事物的具体面相就丰富多了。即是说，理论严密的逻辑终究无法掩盖具体现实

^① 将农村视为传统，这是指笔者研究的西部比较封闭落后的乡村，是从文化意义上说的。城市和现代化的关系引起的质疑最小。当然，秦晖先生认为，如果按照西方有独立人格的市民标准，中国只有龙港是城市，而像北京和上海等其他城市都是农村。详见秦晖《农民文化与改革》，载《耕耘者言》，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的丰富性。就马克思而言，现代化（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指资本主义）的过渡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到达资本主义社会；就涂尔干而言，社会经由“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就滕尼斯而言，是“共同体”到“社会”。这些理论为我们理解现代化的方向提供了指南，但是，具体的现实远比这些理论鲜活和复杂。

具体到农民工，至少要经过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民工二代才能完成转型。因此即使是新生代农民工，也还是“流动的共同体”。“流动的共同体”这一概念有三层意思。首先，流动是共同体式的，共同体是流动的渠道。也就是说，这一理论框架不再局限于理性农民和道义农民的纠缠，而是说明农民兼具理性与道义的品质。当然，流动的第一代农民工道义农民的色彩更浓，新生代农民工，道义与理性的色彩同等重要，甚至理性的色彩更为重要。其次，与将农民工定位于经济理性的视角不同，“共同体”表明了本书重点在于社会文化方面。最后，共同体这一概念是滕尼斯系统阐释的，是“社会”的对立面。滕尼斯用这一概念的原本意义是说明现代化转型的困难和方向，因而本书用共同体而不是体现社会文化意涵的其他概念如“家”“跨越边界的社区”等仅仅体现归属和认同的概念。“流动的共同体”本身表明：共同体主要是通过流动而转型的；流动的过程中，也要寻求认同和借用最为便当的共同体资源。由于流动，带来了共同体内部的分化，出现了农民工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正是在这样的机制中发生变化的。

鉴于共同体因流动而带来的变迁，本书对农民工重新进行了分类^①。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农民工可分为三类（三代）：第一代为纯粹的农民，他们外出是为了履行共同体的义务；第二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为致富而外出，他们在家乡出生、成长，中学毕业辍学后外出务工，务工

① 对于农民工的分类，多数学者仅笼统地谈论这一问题，比如李强、宋林飞等，这也是农民工研究初期的正常现象。或者根据不同的目的进行分类，对于他们的研究目的而言，这个分类也许足够了。不过，如果从农民与现代化的关系来看，这种笼统的说法就显得不恰当了。因此，全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课题组按农民工的现代化程度简单地进行了分类，将其分为农民工、农民工二代或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但这一分类掩盖了很多实质内容，比如新生代的农民工中还存在两个观念差异很大的群体，他们与共同体和现代化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别。有一部分人，在农村出生和长大，在城市接受正规教育，辍学或中学毕业后就外出；还有一部分是在城市出生和长大，和农村完全脱离了关系，回不了农村；从国外的研究来看，对应移民二代，农民工在城市生育和培养的下一代应叫“农民工二代”。因此，本书将新生代分为新生代和农民工二代。

成功则脱离共同体，失败则退回共同体；第三代农民工是在城市出生并成长的一代，社会化的内容就是城市的价值观，因而在观念上真正成为城市人，且也回不了农村，属于共同体流放在外的一代。本书的研究主要定位在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承接第一代农民工的研究，具体展示“传统—现代”转化的机制。不仅如此，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我们知道农民转型的复杂性，也从中寻求现代化的动力，在理论上回应马克思和韦伯的现代化动力问题，从中寻求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具体机制。简言之，该理论框架试图回答：农民工外出与农村和城市存在何种关系；理论上，农民及农村的这些变化与经典的社会现代化理论有何关系。

第二节 过去的研究

一 农民工研究的两个基本假设

对农民工的研究离不开对农民的研究，因为农民工是从农民转换而来的。因而，农民的特点或性质对农民工行为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农民工”一词至少蕴含了这样的前提假设。到目前为止，存在着两个基本的传统，它们都是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来的，不过也反映了农民的几个不同的面相。

首先，农民是道义承载的主体，在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中，斯科特这样概括农民的特征：“把生存作为目的的农民，在规避经济灾难而不愿冒险追逐平均收入最大化方面很具有代表性。”^①按照波普金的说法，斯科特实质上持这样的主张：农民社会的规范和程序嵌入到生存和活命的考虑之中，主张道义经济的学者们将村庄视作仪式和文化的单位，不仅如此，还将村庄看作是农民经济社会资源和权力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实际上，道义农民揭示了农民的理性与常人所理解的理性有差别。通常意义上，理性是追求效益最大化，但斯科特所理解的农民道义是指农民不按效益最大化来组织自己的生产，而是按照“生存第一”

① [美] 詹姆斯·C. 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前言”第 1 页。

② Samuel 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 •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 15.

的法则来组织生产。用斯科特自己的话来说：“由于生活在接近生存线的边缘，受制于气候的变幻莫测和别人的盘剥，农民家庭对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收益最大化，几乎没有进行计算的机会。”^①当然，有学者指出了斯科特理论的缺陷。比如萨缪尔·L. 波普金质疑到：这一理论留下很多未解答的重要问题，或者只是提供了不完全的答案。波普金认为，理性农民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他因而认为，农民是理性的，是建立在个人决策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群体决策的基础之上。^②在斯科特的理论中，道义农民确实不是彻底的个人主义，某种程度上，农民的取向是集体主义的：“村庄所具有的作为一个村庄道德稳固性，事实上最终基于其保护和养育村民的能力。只要村庄成员资格在经济情况下是重要的，乡村规范和习惯的‘小传统’就博得广泛的接受。”^③在现实中，这样的农民不在少数，共同体中的农民就代表了这种类型。

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可以说是道义农民的理想类型。他认为：“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④从这个角度说，农民在行事时，考虑的不完全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个人决策时考量人情关系、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通常群体作为个人决策的依据。共同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本质意志”：（根据这一概念）“只有心理的现实和活动的各种感觉的共存和演替，最好把他们设想为在其整体和相互关系中，完全产生于这个个体本质的原始胚胎结构。”^⑤本质意志可以通过习惯和记忆等表现出来。总之，本质意志就是人本能上的东西体现出来的，它和理性算计的意志不一样。与滕尼斯共同体类型一致的是涂尔干的机械团结：“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所有群体成员的共同情感和共同信仰组成的。”^⑥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血缘和地缘关系，靠情感维系，良心是人际交往的基准；经济生活并不按市场规

① [美] 詹姆斯·C. 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② Samuel 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 ·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p. 16, 30.

③ [美] 詹姆斯·C. 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④ [德]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3页。

⑤ 同上书，第147页。

⑥ [法]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9页。

律行事，而是围绕习惯和自我消费来展开。用萨林斯的话来说：“生产依据家庭的习惯需求而调整，生产以生产者的利益为目的。”^① 人与人在物质上的交换因此很少用货币来实现，物物交换是主要形式。莫斯对部落民的描述也适用于道义农民，他认为：“在斯堪的纳维亚文明和其他为数甚多的文明之中，交换与契约总是以礼物的形式达成，表面上这是自愿的，但实际上，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因为“回礼是义务性的，是被期待的，而且要和收到的礼物相当。”^② 简言之，在这样的社会中，农民重义而不重利。与此相反的另一农民则是理性农民。

理性农民和道义农民分别为两个理想类型，如果把这两种类型放在一条直线的两端，理性农民处于道义农民的另一端。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功能上的依赖，完全靠理性行事。诺斯、威廉姆斯和托马斯等人都认为，在早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行为与制度，可以从独立的个人自利动机中获得深刻的理解。^③ 波普金对斯科特等道义农民理论的超越也正是在这点上，他认为：“一些对前工业社会农民生活的描述理想化了，这些农民生活的浪漫化描述非常夸张，并且误导了我们，使得我们认为农民社会的转型是强加的，而且总是有损于他们的集体福祉。”^④ 他写道：实质上，这些农民决策是有某种目的和一系列推演企图的，他们在有选择的条件下决定怎么做，在消费上，他们追求自己的目标。^⑤ 波普金甚至认为，即使是道义农民理论的“安全第一”和公平观念也是虚构的，比如农民有时候也冒赌一把的风险进行投资；农民进行长期的和短期的投入，对孩子进行投资，参与公共事业都是理性分析的结果。^⑥ 在波普金之前，舒尔茨的传统农业的改造就建

① 转引自 [英] 艾伦·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管可称译，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23 页。

② [法] 马塞尔·莫斯：《礼物：古世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年版，第 4、52 页。

③ 转引自 [美] 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罗家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 页。

④ Samuel 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 ·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 1.

⑤ Ibid., p. 30.

⑥ Samuel 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 1979, pp. 17 - 30.

立在理性农民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人们把贫穷社会中农业的弱小型归咎于工作、节约、勤劳和对更高生活水平相关联的特定的文化价值观是不对的，它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经济事实，即农业经济进步如此小，与刺激小有关，因为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非常低。^①

实质上，理性农民似乎比道义农民更有说服力，因为作为人类，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最强，将理性赋予作为人的农民也不会离真理太远。借阿尔贝的话来说，以理性为基础的理性选择理论是最不坏的理论。^② 所以，很多的农民研究都用此理论。与理性农民的假设基本一致，我国对农民工的研究也呈现出理性农民的理论逻辑，以土地压力说、比较收益论等为理论依据的农民工研究及其出现的多面相都与理性农民有关。

二 农民工的三个面相

在中国，农民工的作用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可，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面相。首先，农民工是从农村向城市的盲流。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农民工是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农民，这些农民在城市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成为城市的下层阶级。于是，城市无产者的各种负面的行为都与他们有关，或者他们有可能像城市无产者一样。特奥多·盖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如此评论：“（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没有立足之地……（因此，在工人中，有）一种沉淀渣滓，[它]不能在职业生活中立足，心理上不能适应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按照地道的雇佣兵受雇的方式去进行冒险、去战斗，而是没有太多的过问，[它]就把拳头、棍棒和指节连环铜套随便借给谁。”^③ 李普塞特发现：集权主义品质一定程度上是低地位人中的标准品质。^④ 马克思同样指出，这些脱离原来生活习惯的人们，无法适应新的生活状态而变成盗匪、流浪者：“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

① [美]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2—25页。

② [英] P. 阿尔贝：《社会学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载布莱恩·特纳编《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297页。

③ 转引自[英] 拉尔夫·达伦多夫《现代社会的冲突》，林荣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页。

④ 详见[美] 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9—97页。

们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① 就我国的研究而言，也存在这样的倾向。比如，王山预言：“流民潮几乎就是社会的一个火药桶……中国社会如果发生大的动荡，无业农民一定是动荡的积极参与者和主要的破坏性力量。”^② 实际上，上述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下层阶级的这些描述仅有部分是正确的，恰如达伦多夫指出的：“下层阶级本身是分裂的，因此，它的大多数成员都在寻求自己的、完全是个人的摆脱苦难的出路。”^③ 尽管农民工是温饱问题解决基础上的求富外出的，不是被迫外出务工的，但考虑到农民在城市的受挫感，或者说严重的不公平感，农民工也并不见得安分。马克思形象地说：一个人一直为自己有间小屋感到非常高兴，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个富人，这个富人在他家隔壁盖起了一座宫殿，这时，这个人的房子在自己眼里突然间成了茅舍。^④ 也就是说，求生与求富都可能是相对的，农民开始是求富的心态进城，但进城后，巨大的贫富悬殊，农民会产生受挫感而采取极端行为；或者，农民进城后因无固定的工作，在城市形成贫民窟。今天的印度、南美诸国出现的贫民窟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在中国，也有很多城中村，比如项飏先生研究的北京浙江村、李培林先生研究的广东省羊城村。正因为农民外流与贫民窟的存在，温铁军等农民学者警告说，中国的城市化要慎行。在和南方农村报记者的对话中，他认为中国正是因为有了“城乡二元体制”以及谨慎的城市化战略，才没有出现西方大规模的贫民窟。^⑤ 贫民窟带来的不仅是流动人口的生存环境问题，更是各种城市治安问题，甚至是社会稳定的问题，报纸和电视等传媒上经常曝光这样的事例。这些现实的案例加上历史上的流民潮所带来的破坏使得我们不难理解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用介绍信的方式限制农村人进城以及随之而来的户籍体制的出台。不过，从实际调查来看，农民外出并不全是负面的，农民外出打工后，村庄反而繁荣了，农

① [德] 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39 页。

② 王山：《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2—63 页。

③ [英] 拉尔夫·达伦多夫：《现代社会的冲突》，林荣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8 页。

④ 转引自 [美] 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7 页。

⑤ 温铁军：《城市化解不了三农问题 乡村建设宜由政府主导》，详见南方农村报，<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 年 7 月 15 日 19:35。